



■ 访 谈

创立中国雅歌的音乐理想

——访歌唱家范竞马

□本报记者 高小立

什么样的歌?其内容、形式及表现方式有什么特点?理论依据是什么?记者带着好奇和兴趣采访了范竞马。

记 者:“雅歌”对大多数受众是一个陌生的词,即使人们接触到了这个词,可能只会从字面上理解为“高雅的歌曲”。雅歌的本质取决于歌曲内容还是演唱形式?请先给雅歌下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义。

范竞马:主要是内容,其次才是形式。雅歌是美声与本土文化有机结合的一种演唱规格,意在建立一种以中国历史文化为基础并与西方音乐艺术融通及对话的、具有原创性和深度表现力的中国音乐和中国歌唱艺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在相同的层面与高度,寻找具有国际性审美尺度的艺术实体和表达方式,做到既可以含蓄而真实地体现中华民族内心深处高贵的文化品位,又能自然地被世界接受认同,是“中国雅歌”诞生的愿望基础。正如欧洲的“艺术歌曲”,既是诗歌和精神深处理性的探索,也是一种浪漫并贴近心灵的诗意表达,他们都是人类共通的艺术语汇和文化宝藏。

“雅歌”(YAGE),来自东方的Chinese Lieder(中国艺术歌曲),其核心是“雅”:通过歌唱家内心世界的袒露和返璞归真的咏唱,在诗性的歌唱中把对汉语的演唱审美提升到美学的高度。在服从汉语的语音规则与特性的前提下,以科学、统一、规范的声音技术为支撑,把中国的歌唱艺术,既高贵又通俗,既考究又自然地呈现在音乐会舞台,妄求超越东西方“诗”与“歌”在审美上的差异和偏见,以取得精神层面的和谐统一。

记 者:很严谨的一段阐述,一看就是经过艺术积累后的深度思考,不是一蹴而就的。你在国外已经闯出了一片天地,出演了大量的歌剧,为什么要回国做一个比较寂寞的事情?致力于推广、传播雅歌的初衷是什么?是想扭转一种现象?还是完全因为个人爱好?

范竞马:可能是来源于一种职业的责任感吧,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国外闯荡那么多年最大收获是见了世面,心胸宽广了,更包容了。所以我不可能去扮演扭转一种现象的角色。艺术家本来就很脆弱,挺弱势的,力求做好自己的职业本分,同时能对社会和本民族担当应有的责任,并自然地影响认同这种理性和唱法的人,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其中。雅歌是一项艰巨而有趣的事业,不是一个事件,是涓涓细流。当然演唱雅歌也是我的个人爱好。

记 者:你形容的涓涓细流却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推广中国雅歌的缘起是什么?

范竞马:2008年,荷兰奇诺唱片公司在寻找能够代表中国人文高度的高级音乐时,我立即就想到了我们的前辈,他们已经创作了许多早在上个世纪初就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继而我们就合作录制了《我住长江头》。唱片在36个国家成功发行,同时还做了相关的研讨、讲座。这张唱片的出版在我心中埋下了要在国际舞台上推广优秀的中国雅歌愿望的种子。

记 者:我们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赵元任、萧友梅、黄自等文化大家创作的一大批歌曲广泛流传,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影响较大,随着时间的检验,这批音乐作品已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比如最具代表性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但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把这样的诗歌与音乐结合而共同完成的歌曲称为艺术歌曲,你为什么将其称为雅歌?雅歌和现在人们常说的艺术歌曲有什么区别?

范竞马:雅歌属于艺术歌曲和室内乐范畴,是诗意的咏唱、较为含蓄和规范,意图要回归歌唱的传统,更加纯粹和本

真,同时具有很高的艺术规格。雅歌音乐会形式可以是多样的,目前我们采用大家熟知的、也是国际通用的弦乐钢琴五重奏的室内乐队的演出形式,目的是在形式上与国际接轨。雅歌应当具有国际化的审美尺度,在演唱规格和曲目内容上,都至少应当与西方的古典艺术歌曲有相同的艺术水准和高度。更重要的是,雅歌的最终目标是要打造和创建汉语在国际舞台上的演唱地位,并为中国歌剧的国际化铺垫良好的、坚实的基础。世界公认的五大声乐流派之所以能够各成体系,同时又能跨越民族的边界而被全世界接受认同,正是因为实现了各自不同的语言特征与统一的美声技巧的完美结合。

我在维也纳的首场演唱会上,亲眼看到了欧洲人被雅歌所感动,当我唱到“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时,发现在前排的一位老人和后面的一位年轻人都流下了眼泪。下来我问了那位年轻人的感受,她说我的演唱使她想起了已故的奶奶。所以,雅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曲,恰恰是非常通俗的音乐表达,是通往人们心灵深处的音乐。

记 者:听你的演唱,感觉你的发声像在说话,吐字非常清晰,这是雅歌演唱的要求还是你个人的演唱风格?

范竞马:其实唱任何歌曲都应该准确、清楚地唱出每一个词的含义。不夸张,吐字清晰考究,自然流畅,像说话一样的演唱,以语言的特征作为发声的基本依据,既得体又高贵,是雅歌演唱的基本要求。希望通过雅歌来恢复吐字的一些基本规格,回归自然的演唱,在诗性歌唱中把运用汉语演唱上升到一个美学高度。我们现时的声乐教育,普遍忽略汉语在演唱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是在牺牲母语的审美和语音规则的前提下获得所谓通畅有共鸣的美声,所以我们的美声顶多只局限于演唱西洋歌剧的咏叹调。我常在讲学中說,我国大多数人学习西洋美声仅仅只局限在“咏叹调”这个狭小的概念里。

记 者:能列举一些你列入你的雅歌范畴的曲目吗?最好举几首离人们较近的作品。

范竞马:雅歌是诗、词与音乐的完美结合,从远古的《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再到近现代诗人的作品,都是雅歌的创作资源。比如《我住长江头》《教我如何不想她》《问》《思乡》《踏雪寻梅》《阳关三叠》《峨眉山月歌》等等。

记 者:推广雅歌的途径与平台是什么?曾经和清华大学有过推广合作,合作方为什么不是更专业的音乐学院?

范竞马:也是机缘巧合,清华大学举办赵元任诞辰120周年音乐会是我主持的,这场音乐会带给我很多收获,不仅接触到了一大批雅歌作品,还和清华达成了合作协议——作为雅歌的学术基地。之所以和清华合作,是雅歌需要学术上的文献支持,需要历史、文化、人文的力量。当然也希望专业音乐院校的协作与支持,因为这不是哪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是音乐、学术界的事,是中国音乐的一项事业。

记 者:这些年,像郎朗,包括你这样的歌唱家频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中国音乐作品在国外的传播仍是弱势,远不如中国的音乐家在国外的影响力。你回国后致力于将中国歌曲推向世界,中国作品的走出去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意义更大。你对雅歌的演唱和推广偏重国外还是国内?仅以你个人的力量是否太艰难,目前最需要的支持是什么?

范竞马:我其实已经在国内默默地尝试着推广有好几年了,也得到了许多机构和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士的支持。比如我非常看好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平台。最让我惊喜又意外的是,还是在前年,我父亲就告诉我说,我们的前副总理李岚清

2013年12月23日 星期一

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广中国艺术歌曲,并出了书,还在全国的校园里讲学和推广,这让我顿时信心倍增。我之所以先到了欧洲正式首演,纯属是雅歌的缘分和机遇巧合。再加上我在国外有一定基础和听众,欧洲有欣赏艺术歌曲的传统,有室内乐的环境,有规范的演出模式和成熟的演出市场。我们在奥地利和斯洛伐克的几场演出都被排在正式的演出季当中,对我们来说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音乐演出活动。我希望看到因为我们的演唱,一个外国歌唱家只要学习中文的吐字和发音就能和我们一样地演唱中国雅歌,就像我们演唱德奥的艺术歌曲那样。

在国内目前主要是通过做小范围的雅歌沙龙,同时确立起学术平台,吸引学者、知识界人士了解雅歌的艺术魅力。在推广上以进校园和高端精英人群为主。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将设立中国雅歌艺术专项基金的相关事宜也正在进行中。

记 者:在全民看《中国好声音》、娱乐是王道的背景下,我们来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雅歌,好像和当下的音乐审美不太合拍,但大众把目光集中投向“中国好声音”时,我们更需要对中国好声音到底是什么声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能误读了中国真正的好声音。要想把已经丢失掉的中国歌唱传统找回来,在推动雅歌上,最终会走向大众传播的平台吗?看了我们的访谈后,一定会有观众问及到哪里能看到你的雅歌演出。

范竞马:中国的确有太多的好声音!而我们更需要有文化内涵的、有思想的声音。我们应当重新审视我们的主流文化观,是否一切已经被低俗的娱乐风替代?我们不乏唱歌的人和歌唱家,但我们更需要歌者和歌唱的诗人。就像Bel Canto一词被翻译成“美声”,而实际上更确切的翻译应当是美妙的歌,或美妙的歌唱。恰恰我们缺乏的是后者。我真心地希望能看到中国雅歌登上大众化的平台,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沙龙和国界之外。观众只要关注中国雅歌,就能看到演出。

记 者: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批艺术歌曲,其作者多是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通过音乐的翅膀完美诠释了中国诗词的汉语言魅力。比如《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歌词就是刘半农的一首白话诗,通过赵元任的谱曲,将中国诗词与音乐完美结合。当下的艺术歌曲创作好像很少以一首诗歌作为歌词,是我们的诗歌太深奥甚至晦涩,不太好谱曲,还是作曲家已遗忘了诗歌?艺术歌曲创作的严重匮乏是当下需要正视的问题,包括你说的雅歌,你在推动创作上有什么设想?

范竞马:说到创作,这击到了我的痛点,人才与资金是两大困扰。刚刚收到高为杰教授用元曲谱写的三首雅歌,我们欣喜若狂。我们初步计划征集和挖掘并录制100首中国雅歌,广大的诗人都是雅歌的词作者,当然离不开作曲家们为之谱曲,包括“70后”、“80后”的年轻作曲家。我希望能借用国家的平台逐步建立雅歌的创作机制。

记 者:现在是文化多元时代,音乐文化更是如此。雅的对立面是俗,雅歌的提出,是否会遭致民歌和流行音乐爱好者的反感?

范竞马:首先要承认雅是现实存在的,雅歌没有对立面,百花齐放,多元音乐永远都是共同前行。

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中国雅歌从2008年的萌芽状态算起,也才5年,范竞马推广雅歌的路可能会很长。他一再說,“好事不在忙上。”我们已经有太多昙花一现的东西,我们已经习惯了疾风暴雨而失去了做事的耐心。但我们期待着中国雅歌(Yage-Chinese Lieder)在世界音乐星空的灿烂辉煌。

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申报、轻保护”的倾向得到调整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中国珠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保护工作座谈会”日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与会者以珠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切入点,结合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与传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珠算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是中国人有关数的知识与实践,它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数理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非凡创造力,对促进中华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会者认为,珠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助于扩大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促进和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它体现出国际社会

对其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认同,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来源于日常生活的人文创造力的尊敬。

中国珠算申报成功后,中国以总数38个项目成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认为,尽管有些地方、有些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还不足,有些地方还在把申报材料当作宣传媒体影响力、经济资源开发的途径来开展工作,但从整体上看,过去“重申报、轻保护”的倾向已经得到很大调整,各地都加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他认为,申报只是手段,只有按照科学规律做好保护工作,既重申报,同时又重保护,这样的申报才有意义。同时,保护要从实际出发,保护的方式可以是战略性、整体性的,也可以是生态性的,总之应以更务实、更有效的措施推进保护工作。(徐健)

中国美协举办第三批“名家画澳门”系列采风活动

“名家画澳门”采风活动。

2013年1月21日至25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刘进安为团长,孙志钧、韩敬伟、李洋、许俊、黄华三、唐辉等为团员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代表团一行10人作为第二批“名家画澳门”艺术家赴澳门进行采风交流活动,澳门销量最大的中文日报《澳门日报》就此次“名家画澳门”采风活动进行了全面报道。

我国有句老话:“有容乃大”。从地理上讲,澳门是座小城,但这座融合了古老历史与现代活力的小城,其文化的多元,襟怀之大,包容之多是值得美术家们用笔去赞美和歌颂的。每批参加采风活动的美术家们在与澳门有限的近距离接触中,都领略了它的韵味,感受了它的温情,体悟了它的真意,这些都将成为丰富而别样的创作素材,激发美术家们的创作灵感,并最终通过画笔予以表现和抒发。

(王然)

■ 新作点评

幽灵即角色——观话剧《六个寻找剧作家的剧中人》

□ 彭 俐

看中国人艺演员邹建、王欣雨等演出、俄罗斯导演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与中方导演王鹏、韩清联合执导、意大利剧作家路伊吉·皮兰德娄创作的话剧《六个寻找剧作家的剧中人》,是一件很绕圈子的事情,戏剧舞台呈现的纠结又让观众陷入一个谜团中难以自拔。从意大利文剧本原作到英文、俄文再到中文的翻译过程中,不知道流失了什么,也不知道添加了什么,终于等到导演、表演这一舞台再现环节时,又不知是忠实地表达了剧作者的原意呢,还是无意中背离了原作的某些初衷,所有这些,我们都无从判断。可以判断的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皮兰德娄,绝非等闲之辈,而是现代戏剧的革新者,他的获奖理由是:“他果敢而灵巧地复兴了戏剧艺术和舞台艺术”。

90年前,即1923年,该剧在写成两年后于法国巴黎上演,使剧作家皮兰德娄获得了世界声誉。他的作品也影响了当时的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戏剧,该剧的主题涉及哲学问题,即艺术与生活存在冲突。艺术想要真实地表现生活,但生活的真实只是每个人心中的想象,生活足够广阔、庞大、复杂、诡秘,甚至不可捉摸,不可名状。这就显出戏剧人的尴尬,戏剧人自以为是在塑造一个活生生的人、真真切切的人,否则,编剧、导演和演员都会觉得无聊,没有人愿意在剧本中、舞台上弄虚作假。但是,我们想想看,无巧不成书,无假不成戏,有意无意的弄虚作假,岂是戏剧所能避免,就连现实生活中的恐惧也难免。皮兰德娄的巧妙在于托付幽灵,即将这些高深的理念和玄学意味的思考、质询,乃至质疑和辨析,都一股脑儿托付给剧本中有意设置的六个寻找剧作家的幽灵。幽灵,可以幽幽地说话,说些理性的疯话和疯癫的实话,无人追究,更无人怪罪。我们常人其实不太愿意或没有耐心,倾听处在同一个界面的同类的絮叨,却对类似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比如幽灵的宣讲倍感兴趣。于是,剧情就在这样的特定情境中展开。这本是皮兰德娄的巧安排,但是,不知为什么,俄罗斯导演彼得罗夫没有凸显幽灵的身份,而是在舞台上做了现实化、生活化的处理,让那寻找剧作家的六个剧中人具有了活人的身份。至少除了两个小孩儿以外,那四个大人怎么看怎么像是活着闯入剧院、闯入戏剧排练场的。这让排练场上的导演对不速之客或“非法闯入者”倍加反感,邹健扮演的父亲与米铁增扮演的导演争执不休,剧情就这样展开并在矛盾对立和言语冲突中发展,各说各的话,各讲各的理,不时有思想的机锋与锐见出现,也常有匪夷所思的情景再现,让观众知道这是“戏中戏”里埋伏的机关或包袱。

其实,这本该是剧本中的角色以幽灵的形式出现,来和扮演他们(幽灵的前身,即活着的人)的演员之间的对话,即阳界的人与阴界的人之间的对话,因为死去的人——即幽灵对自己活着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和所思所言,包括最见不得人的一切,最有清醒的认识,也最敢于裸露曝光,最能直言不讳。然而,很可惜,我们见到的却是一个太过现实的冲突,以致这“六人”一



家的故事或曰悲剧,抢了剧作家皮兰德娄要表现的哲理的戏。我们的观众被迫在故事和哲理两端徘徊不已,在声色与思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不知是体味和感受离奇的、接近乱伦的家庭内幕更重要呢,还是思考和理解诸如“艺术反映现实上的局限性”、“人与人相互沟通的困难性”的观点和见解更迫切。色情与血腥兼具的情节在夺人眼目,睿智与深邃同在的哲思在俘获心灵,两相抵触的导演倾向,让观众失去了观赏的趋向,即凝聚注意力的方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好在剧作家所持的观点还是清晰可见——一个不无荒诞的、不甚知名的、不可言喻的外部世界与一个充满太多欲望、各色希冀、样样执著、种种焦虑的现代人的内心世界之间的对立、冲突,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常常是不可逾越的。至此,我们作为戏剧观众,还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当我们饱享了感官的视听之娱之后,还获得了头脑和心灵的滋养。

为此,真要感谢我们相识或未曾相识的皮兰德娄的译者,无论是文字的还是舞台的诠释者,感谢人艺能够将人类历史上经典剧作家的经典作品移植到中国舞台。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戏剧领域的传奇人物皮兰德娄,在他知道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之前,就已经将他自己的戏剧作品定位在心理主题上。他认为,艺术永恒,生活无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戏剧,喜欢美滋滋地坐在剧院里的原因。他的以下言说,可以表达他独特的艺术与生活观念:“生活是一场十分悲哀的插科打诨,因为我们内心总是需要创造一个现实以欺骗自己(各人有各人的现实,彼此从不相同)……我的艺术对于欺骗自己的人充满着辛酸的同情,但是又必定会对逼迫人去欺骗的命运加以无情的嘲讽”。